

中国古代文明 十讲

李学勤/著

/考古学与古代文明

/甲骨学与古代文明

/青铜器研究与古代文明

/简帛学与古代文明

/古代文明与学术史

名家
专题
精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明十讲 / 李学勤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8

(名家专题精讲)

ISBN 7-309-036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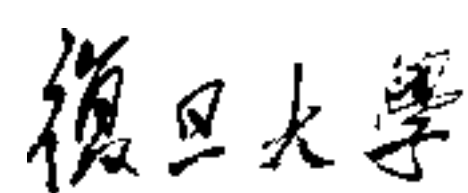
. 中... . 李... . 文化史 - 中国 - 古代
. K2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46054号

中国古代文明十讲

李学勤 著

出版发行



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 @ fudanpress. com <http://www.fudanpress. com>

责任编辑 陈麦青

装帧设计 周 进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8.75 插页 2

字 数 226千

版 次 2003年8月第一版2003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6000

书 号 ISBN 7-309-03663-8/K · 119

定 价 1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遵照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要求，我选取了近年一些小文，汇编成这本《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十讲”这种体裁，使我联想到少年时读过的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好久未见用同样字面的书了。复旦这套书已出的几本都很精彩，我能追随其后，很觉得荣幸和欣悦。

我所致力的领域，常给人以杂多的印象，其实说起来也很单纯，就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体与《史记》的上下限差不多。问题是对这一段的研究不太好定位，有的算历史学，有的算考古学，还有文献学、古文字学、科技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等，充分表明这个领域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这一领域，我想最好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1998年，我给《殷商历法研究》一书作序，曾乘机提出：“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应当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科来看待。对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研究，都有着专门的学科名称。比如研究古代埃及的学科是埃及学，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是亚述学，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的是古典研究，等等。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没有一个单独的学科名称，这大概是由于中国文明一直绵延下来，中间没有断绝，而国际上所谓‘汉学’这个词，同埃及学、亚述学等就无法同日而语了。其实，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以至夏商周三代这一大段，既不同于史前时代的纯依据考古，又有别于秦汉

以下的文献完备，必须同时依靠文献和考古两者的研究，这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形是一样的。我相信，中国古代研究将来一定会被承认是一个重要的专门学科。”在其他地方，我也说过类似的话。

这里应当引述去年初逝世的张光直先生的有关见解。1994年，在台北举办了一次题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研究”的研讨会，张光直先生提供的论文是《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他指出：“我们在20世纪的后期和21世纪的前期，有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来创造一个新的学科。”这个学科，他称之为新的“先秦史”。他说：“中国的先秦史，作为一门有系统的学科，需要从头一砖一瓦地盖造起来。有文字以前的传说古史，自《古史辨》的时代就已经知道是大不可靠的了。自从20世纪初期以来，考古学的发现愈积愈多，愈多便出现好些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听过、想过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问题。用考古学建立的历史因此更得随时改变。考古学还发掘出新的文字材料，加强了古文字学这一门学问。研究夏商周三代历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学。近百年来使用古文字学的结果，是知道了传统的三代古史有许多处被古文字学证实了，但还有更多处被古文字全部改观了。”

张光直先生将新的学科仍称作“先秦史”，如他自己说的，是受他的老师李济先生《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等的影响。李济先生“古史重建”的主要趋向，是在考古学基础上重构古史，因此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并非平行的。张光直先生的看法有所不同，他强调了从龙山文化时代到夏商

周三代，“文字的资料逐渐加入历史资料里去”，甚至说“传世的文献是三代历史的基本材料，其中可能也包括时代早到龙山时代的传说”，足见以文献为主的历史学当与考古学并重，但他还是接续李济先生，把设想中的新学科叫做“史”——“先秦史”。

有学者注意到这里可能存在的矛盾。曹兵武博士说：“中国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历来是难于争论清楚的……而张光直先生一直在尝试着另一种整合。他认为在这个领域中，考古学与历史学不是谁证实谁、谁服务谁的关系，而且根本上就是一回事。在古环境、古人类学、田野考古学、古文字学等自然与社会科学都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收获的今天，非常需要我们用新眼光、新理论、新手段，从全局的观点，从人类生活与文化演进的角度去处理新材料，从而构建一个新的史学结构。……我们不妨沿着张光直先生的思路走得更远些，径称之为‘中国文明史’——一个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和形成为对象的新学科。”这样的想法，我是非常赞成的，只是感到叫“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或许更贴切些。

编进这本《中国古代文明十讲》的，有的是论文，有的是讲演，时间、篇幅和体例都不尽一致，还难免若干重复的地方。有些内容，我做了必要的补充修改。尽管费了不少力气，然而最后通读，仍觉殊不满意，只好恳求读者见谅和指教了。

李学勤

2003年6月3日

注释：

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李学勤序，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

臧振华编辑：《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第1—12页，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又见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第31—44页，三联书店，1999年。

《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第81—97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曹兵武：《考古与文化》，第115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又见三联书店编：《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第137页，2002年。

目 录

序 言	1
1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1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一百年	2
二十一世纪的古代文明研究	16
古代文明与文化发展战略	29
2 古代文明的发展过程	33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34
东周至秦代文明概观	56
3 考古学与古代文明	81
中国考古学与古代文明研究	82
良渚文化与文明界说	89
4 文字起源研究与古代文明	93
文字起源研究是科学的重大课题	94
汉字 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97
5 甲骨学与古代文明	103
殷墟甲骨发现一百年	104
甲骨文的世界	113
甲骨学的七个课题	123

6	青铜器研究与古代文明	133
	青铜器的研究及其展望	134
	中国青铜器的两个高峰	151
7	简帛学与古代文明	159
	简帛书籍的发现及其影响	160
	简帛和楚文化	174
8	古代文明与区域文化研究	189
	多彩的古 代区域文化	190
	夏商周与山东	198
	青铜器与山西古代史的关系	214
	蜀文化神秘面纱的揭开	225
9	古代文明与多学科交叉研究	229
	古代文明研究与“夏商周断代工程”	230
	文明起源的科学考察	237
10	古代文明与学术史	241
	《中国学术史》总序	242
	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	249
	附录：从最新发现看古代文明	259
	遂公盨与大禹治水传说	260
	眉县杨家村新出青铜器说明了什么	263
	济南大辛庄甲骨卜辞的初步考察	267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1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一百年

20世纪是一个风云变幻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不但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而且我们的传统文化也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曲折。在我们跨入21世纪之际，怎样认识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状况，如何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这是许多人都非常关心的事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学术界，特别是文科学术界，现在都非常迫切地需要对20世纪学术发展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回顾，对21世纪的学术发展前景进行展望。为此，我想从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研究一百年的状况进行简要的回顾，并对21世纪的古代研究前景作一些展望，以期能有益于学人。

怎样认识
20世纪中国学
术的发展状况，
是许多人都非
常关心的事情。

每一个人，
不但要认识现
在，还要认识过
去。

我们每一个人，不但要认识现在，还要认识过去，这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实际上，社会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文化不高或没有文化的人，对古代都有一定的兴趣。许多人对评书、演义和这一类的戏都感兴趣，即是说明。许多人对历史上的过去，对于各种事物的起源，特别是对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辉煌文明的国家的古代文化更感兴趣。而在现代大潮冲击了中国之后，如何认识古代这个问题就成了中国社会上各方面的人都会接触到的一个问题。

中国有着悠久辉煌的古文明，有着历史绵远的传统

文化。从地理大发现以后，特别是16、17世纪之后，西方势力开始向东方发展，东方人开始接触到了西方。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一个与他们过去认识的世界完全不同的新世界。西学逐渐进入中国，对中国学术界、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古代的认识形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使中国人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很基本的特点，就是人们一直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越古越好，所以三代以上就是人类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如宋代理学家常说：“人心乃是牵补度时，天地亦是架漏过日。”意思是说：人心已经坏了，好像一件衣服破了一样，今天打个补丁，明天打个补丁，但无论如何也总不能达到完美的程度。天下世界也不如过去了，这就好比一个屋子已经漏雨了，即使你今天往屋顶上放几块瓦，明天往屋顶上堆一些白灰，但总也不能让屋子不漏雨。这是为了说明，现在的社会已不如过去的社会，人们能够取法的只是圣贤存在的那个三代时期的黄金盛世。由此可知，中国人对古代的认识问题，是一个牵扯到他对于整个人生、世界的看法的最根本的问题。

因此，在中国古代，经学就成了整个学问的核心。经就是从黄金时代传下来的书。有不少中国人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初，还在专读经书。只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到了19世纪晚期，由于西学的兴起，时势的发展，才迫使清朝政府不得不下令废科举，成立学堂，用新的学科取代读经。因为当时如不这样，国家就不能自立，我们就无法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打交道。在这种情

西学逐渐进入中国，使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古代的认识形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

中国人对古代的认识问题，是一个牵扯到他对于整个人生、世界的看法的最根本的问题。

不打破古代的偶像，不足以使人们接受世界的新知识。

康有为的两部书在当时的知识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一部是《新学伪经考》，一部是《孔子改制考》。

清朝人治学非常讲究门户

形下，人们对古代的认识必须有所改变。如不打破古代的偶像，就不足以打破旧的网罗，不足以立新学，不足以使人们接受世界的新知识。因此，中国人对过去、对古代的认识，伴随着戊戌变法和康有为的著作的出现，就必然地走向了解体。

康有为的著作很多，其中有两部书在当时的知识界可谓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一部是《新学伪经考》，一部是《孔子改制考》。他的学生梁启超就曾说过，读了这两部书如触雷电一般。过去人们对古代的认识主要是依靠经书而来的，而这两部书宣称，经书中的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真正的孔子学说，而是新莽时刘歆伪造出来的。王莽是靠篡位爬上皇帝宝座的，在正统观根深蒂固的中国人心目中是很臭的。因此把经学说成是王莽“新学”，就等于给经学戴上了一个大帽子而加以否定了。因此，这两部书的出现，是对传统的中国人的“古代观”的否定，是疑古思潮的开始。

疑古，就是对古代的怀疑。康有为用来取代旧偶像的学说依然披着孔教的外衣，但从政治和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康有为的学说在当时是进步的，起到了冲决网罗的作用。康有为的所谓“孔学”并非他个人独创，而是得助于当时今文经学如日中天的时势。清朝人治学非常讲究门户，他们把汉朝的学问分成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块。清朝乾嘉时，学者们最喜欢讲贾逵、马融、郑玄这些古文经学的代表，清中叶以后又开始提倡今文经学。从龚自珍、魏源这些进步的思想家开始，到光绪时期，四川出了一位今文经学家廖平，他站在反对古文经学的角度

上，认为包括《周礼》、《左传》等许多古书在内的绝大多数古文经书都是刘歆伪造的。据廖平和梁启超记载，康有为有一天在广东会见廖平，两人论学，廖将上述观点讲给康听，康勃然大怒，认为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廖很不高兴地离去了。但不到半年之后，康有为不但全盘接受了廖的观点，而且比廖讲得更激进。在此不能仅从道德的角度考虑问题，因为廖的学说是从研究经学的角度出发的，但康有为则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充分利用其中对自己有用的内容，其目的首先不是学术。从此之后，疑古之风越来越盛，这种风气在古代研究方面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了。

胡适及其弟子顾颉刚先生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古史辨派，提出了层累造成的古史观。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有关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尧、舜、禹、汤等的传说，时代出现的越晚，内容就越丰富，就如同民间故事一样。顾先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山鼻祖，在研究孟姜女的故事、妙峰山的崇拜等方面有很大的成就。他把民俗学的观点运用到古史研究上，认为中国古代的传说是越来越多，越造越古，越传越复杂，所以中国人对古代的看法是历代人不断地造伪的结果。

古史辨派在当时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其进步作用可概括为下述三点：

第一，进一步打破了“古代就是黄金时代”这一传统观点。传统观念认为古代遗留下来的经书的内容万古不变，为了维护经书的尊严，就要坚持古代是黄金时代的观点。现在古史辨派指出古代有些东西并不是进步的，而

胡适及其弟子顾颉刚先生创立了古史辨派，提出了层累造成的古史观。

进一步打破了“古代就是黄金时代”这一传统观点。

且存在许多问题，这有助于冲破网罗，促进学术的发展。

对几乎所有的古代文献进行了重新审查，对传统的古代观进行了一次大扫荡。

第二，古史辨派对几乎所有的古代文献进行了重新审查，这和欧洲在文艺复兴后对以《圣经》为代表的文献进行审查一样，为繁荣新的文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三，古史辨派及其所代表的疑古思潮对传统的古代观进行了一次大扫荡，从而为建立新的古代观开辟了道路。这也正是现代考古学能在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建立，并为中国人接受的根本原因。在传统观念中，中国人最痛恨“偷坟掘墓”。在传统的刑法里，对挖坟的人都要处以最高刑罚。由于疑古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识和崇拜进行了大扫荡，有利于以发掘为主要手段之一的现代考古学能传入中国。

疑古思潮所起的副作用。

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疑古思潮所起的副作用。由于古史辨派在疑古时，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们对古代的否定常常过头，对一些本来不应怀疑、不该否定的内容也加以怀疑和否定，结果在辨伪上造成了不少甚至说是很多的冤假错案。而如果对古书和古代全部加以否定，那么古代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中国古代也就没有什么历史、学术，中国也没有什么传统文化了。如胡适就曾说“东周以上无史”。《诗经》、《书经》、《周易》、《周礼》等都不可靠，《左传》中所讲的东西多是假的，这样一来，东周以上就没什么可信的古史了。

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人对古代的看法可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个发展阶段。

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在他给《古史辨》第六册所写的序中，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他认为中国人对古代的看法可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个发展阶段，这个观点符合辩证法，受到了多数人的信赖和接受，并得

到流传。信古，就是说古书中怎么说我们都相信。信古的对立面就是疑古，即对古书上说的都怀疑，都不相信，或者说主要的不相信。显而易见，没有疑古也就没有信古，也就是说，只有到了疑古思潮之后，我们才知道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个传统的信古时期。冯先生还认为，只有疑古是不够的，还应对古作实事求是的研究，即对古要进行解释。如果你说古人说的不对，就要说明为什么不对，因此就需要释古，即对古要进行解释说明。

冯先生的这种说法，应该说今天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益的。传统的古代观是信古。由于信古，人们不易接受现代的思想观点，于是出现了疑古思潮。疑古有利于现代化的输入，可由于太过了，因此还要对古进行解释。只有对古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我们才能对古代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对中华文明的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有全面、深入的了解。

冯先生虽然提出了“释古”这个词，但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释古，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需要我们做出努力的大问题。这里可以说，现代考古学的成果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便利条件。

有些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研究古代器物和文字的风气，因此，考古学在中国就如同古代一样古老。这种看法其实并不正确，中国虽然至少在西周时就有人收藏古器物，汉代时就有人研究青铜器，但这并不能说明考古学在那时已经出现了，因为现代考古学的基本概念是由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层位学、类型学等理论和方法构成的，它有着自己的一套独特的科学工作方法，而这一套理

只有对古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才能对中华文明的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有全面、深入的了解。

有些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研究古代器物和文字的风气，因此，考古学在中国就如同古代一样古老。这种看法其实并不正确。

论和方法，直到20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后为中国学者掌握运用。在这之前虽曾有部分外国人在中国进行过考古调查发掘，但这并不能视为中国考古学建立的标志。

真正由中国人搞的考古发掘，是1926年由清华学校李济在山西省西南部的夏县西阴村主持的发掘。

王国维在其讲义《古史新证》中对疑古思潮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新的认识古代的方法，即“二重证据法”。

中国的考古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就是考古研究同历史研究密切结合。

真正由中国人搞的考古发掘，是1926年由清华学校李济在山西省西南部的夏县西阴村主持的发掘。李济，字济之，湖北钟祥人，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回国后到1925年成立的清华研究院任讲师，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共同执教。清华国学院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首先在国学院成立时，王国维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指出历代学术史上新的潮流的产生常常是由于新发现引起的，在当时的最近二三十年有四大发现，其中甲骨文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古代，特别是商代的看法，使东周以上无史论不攻自破。此后，王国维又在其讲义《古史新证》中对疑古思潮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新的认识古代的方法，即“二重证据法”，就是以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互相印证。这为现代考古学，或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现代考古学真正系统地在中国展开，是从1928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后，主持对殷墟进行发掘开始的。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殷墟的发掘工作进行了15次。与此同时，在其他地方也开始运用现代考古技术进行了考古发掘。但殷墟作为主要的考古工地，从1928年至今，70余年间不断做出重大贡献，其重要地位没有动摇。中国的考古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就是考古研究同历史研究密切

结合。这与其他一些国家把考古研究主要与美术史、人类学及社会学的研究相结合是不相同的。有学者写文章评中国考古学，认为中国考古学的最大的缺点就是过分与历史学相结合，只有打破这一点才能吸收新东西。可我个人认为，从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到现代考古学的建立所形成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传统，正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

从殷墟发掘的早期开始，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一系列非常重大的成果，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特别是在“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时间内，我们的考古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81年英国剑桥大学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的《考古学简史》出版，封面图是中国的秦俑坑。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展望中，他说今后几十年考古学的希望在中国。我认为他的这个预计是客观而科学的，因为中国的新发现层出不穷，其结果将对世界学术界产生重大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的考古学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人，甚至国外汉学家对中国古代的看法。我们也深信，在信古→疑古→释古的历程中，考古学不但会对史前时期、三代时期、秦汉时期的释古做出贡献，即使是对于汉唐以下的释古也会做出重大贡献。

要对古代进行科学的研究，仅仅有文献和考古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定的理论。只要我们比较一下20世纪初出版的关于古代的书和现代谈古代的书，我们就会发现

今后几十年考古学的希望在中国。

中国的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人，甚至国外汉学家对中国古代的看法。

要对古代进行科学的研究，仅仅有文献和考古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定的理论。